

故居，乃古今常用詞。「居」為名詞，即居所、居處。「故居」原意是指故家、舊居，即老家的宅子，如《楚辭·遠遊》：「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陶淵明《還舊居》：「履歷過故居，鄰老半復還。一阮籍《詠懷詩》：「翩翩從風飛，悠悠去故居。」如今報刊文中多指某人生前居住過的房屋，如「杭州孩兒巷陸游故居」、「北京阜成門內魯迅故居」。所以《現代漢語詞典》解釋為：「曾居住過的房子。」惜過簡而欠全面。《「故居」一詞在現代漢語中使用率雖較高，但若不注意，也可能出錯。以下舉近期數例略為說之。

馬斗全

北京《光明日報》二〇一一年三月二十日《河南鹿邑公祭老子》：「相繼興建了道祖文化廣場、老子故居……」四月二十七日七版又有《重建故居慰先賢》之題。《中華讀書報》此前也曾有《北京將復建曹雪芹故居》之文。此幾處「故居」，皆指名人人生前居住過的房屋，所以只能保護或修繕，而不能「重建」。《復建》的若舍，便非故居。為幾千年前的古人「重建故居」，應屬笑話。《光明日報》前還曾報道過，亳州華祖庵有「華化故居」，此「故居」顯然也屬用詞不當。

### 文史叢譚

## 說「故居」

《光明日報》二〇一一年五月十八日《忠烈門前叮嚀長》：「在故居的屋簷下，烈士的後人聚在一起，留下一張合影。」烈士的後人並沒有在那裡居住過。只是來此懷念先輩，所以那屋子只能叫「祖屋」或「老宅」，而不能叫「故居」。

《光明日報》近又數有戰爭年代毛澤東或其他領導人某地「故居」之說。此等說法歷年較多，所以這裡須多說幾句。故居，除屋子屬於該人自己或租為己用而居住一個時期外，還應就院落、房舍而言，一般不指單個房間。如果於別人家裡臨時居住或借住過一室，則不當叫故居。如某人在國外遊學或滯留半年，歸國後不當說所住某家某房間為其故居。還有，隨機關或團體暫住某處，機關或團體為安插所住之房，也不當稱故居。如某人隨中國體育代表團在某國訓練比賽半年，不能說某賓館某房間為其故居。毛澤東等領導人作為一員而住中央機關或部隊臨時借用老百姓之房，尤其是借住人家院中二間，顯然不當稱「故居」，只能叫「曾住過的房間」。二〇一一年二月七日《文匯報》「筆會」副刊關於張大千之文說：「摩耶精舍是張大千先生最後一個故居。」讀之有些驚愕。在張大千來說，不宜說「平生故居」，也不宜說「最後一個故居」，該句似可改為「摩耶精舍是張大千先生平生最後一處居所」。又，《文匯報》「筆會」還曾有《踏訪張大千故居》文，也未當。故居，指房舍，非較為廣闊之地，所以不宜用「踏訪」一詞。

## 《穀雨文藝月刊》

許定銘

黃俊東從澳洲返港，贈我一冊《穀雨文藝月刊》，刊內空白處用毛筆題辭，說《穀雨》是一九四〇年代最難蒐集的廣東文藝雜誌，選說內容充實，很能反映廣州戰後文壇的水平。翻了幾本現代內容辭典，只找到一九四一年，丁玲、艾青等在延安成立「穀雨社」，所出版的《穀雨》雙月刊，而沒有《穀雨文藝月刊》。後來從零碎的資料得知，廣州出版的《穀雨文藝月刊》於一九四七、四八年間，約出過五期。

如今大家見到的一九四七年九月號《穀雨文藝月刊》，三十二開，二十八頁，用極粗糙的報紙印製，目錄就排在封面的右下方，可惜用了淡灰色，經過六十多年歲月的洗禮，已褪至幾乎看不見了。

《穀雨文藝月刊》是詩、散文、小說、木刻和理論的小冊子，由廣州惠愛西路的「穀雨文藝雜誌社」出版，范美、范雷和畢彥三位主編。薄薄的月刊中，沒有創刊辭，范美的詩《種籽的出土》排在首頁：「被雨／是播種的季節，／然而老天卻吝吝者而：／新的伊甸已在「人造雨」……」可視為他們創刊的理想：希望趁天氣好，勤播種，得大豐收。所刊二十篇文中，只有寫《詩人與詩》的曾卓是大家熟悉的詩人，三位編者和錦釗、艾魯、康歌、周鏡、耳氏等，大抵都是當時的文藝青年吧！



「主婦太可惡，幾致與之口角。此婦亦殊有才幹，惟視此屋為一營業，故視一錢如命，為可噁耳。今日遷居世界學生會所，初次離群索居，殊覺淒冷。昨日與金清若相成，不復打牌。」儘管是官費，可是也有本世紀中國留學生的遭遇，時不時還會碰到惡房東，也嘗過「寄人籬下」的感覺。

如果用簡單的幾句話概括胡適在康奈爾大學的生活，他學的是農科，可除了上課之外，許多時間是花在讀歐美的文學作品，其餘還有讀經、訪友，其中打牌幾乎是一段時間裡每天的休閒活動。到了後期，他開始到各種社團聚會中演講，或是寫文章賺錢，寄回國內養家。

「昨夜尋思非賣文不能贖家，擬於明日起着德文漢法一書，雖為貧而作，但自信不至誤人也。」

其實，當時胡適的家境也還貧寒，如果不是以優秀的資質考取了庚子留學生，他恐怕也就不會走出國門去留學。而胡適原名胡適之，因為北上考試，很怕考不取給人笑話，於是把表字裡的「之」字去掉，用一個從來沒用過的名字「胡適」應考。

胡適最初硬著頭皮學農，成績不錯，大都在八十五分以上，可是一段日子後，還是慫不住要改行，一是沒興趣，課餘常出去演講，名氣越來越大。還有就是覺得中國那種種姓制度，農業可以維持生計，可是救不了國家。最終他還是改變了專業。一九一四年六月，胡適在康奈爾大學文學院畢業，繼續念哲學研究院，一年之後轉學哥大。改學哲學，成了世界著名的哲學家杜威的弟子。

當時的這批官費留學生，日子過得真不賴。根據唐德剛的描述，「那時的庚款留學生，學雜費之外，每月生活費為八十美元，實在是個了不起的數目。」

## 留美學人中的一代天驕

葉周



在容閑發起組織的幼童留學後，在中國留學歷史上同樣有重大影響力的是一九〇九年開始的庚子賠款留學運動。庚款留學生培養出了二十世紀中國的一批棟樑之才。其中著名的就有文學泰斗胡適、氣象學家竺可楨、語言學大師趙元任和中國航天工業的奠基人錢學森等。

庚子賠款源於一九〇〇年美、英、日、俄、法等八國聯軍取得了對義和團宣戰的勝利後，於一九〇一年迫清廷簽訂的辛丑條約，其中要求中國對列強作出巨額賠款。因為一九〇〇年是庚子年，所以稱為庚子賠款。在條約中清廷要向外國賠款四點五億兩白銀。美國分到的賠款是二千五百萬美元，加上三十九年的利息，總數為四千六百萬美元。

一九〇六年，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在給美國總統老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說：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於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穫，與軍旗相比，道義與精神將更有力地支配商業，在未來以知識和精神支配中國新的領袖。美國總統老羅斯福最終作出決定，將美國得到的庚子賠款的半數退還給中國，用作中國留學生留美獎學金。

在中國駐美公使梁誠與美方經過四年的討價還

價，庚子賠款獎學金於一九〇九年設立，中國負責留學生的選拔和訓練，並將每年篩選出的人選送往美國。前後約共選送了一千多人。庚款退款辦學迅速制度化，為了保證留學生質量而設立的預備學校後來成為大名鼎鼎的清華大學。而獲得庚款資助的留學生，赴美所就讀的都是一批位於美國東部的名牌大學，其中就有哈佛、耶魯、哥倫比亞、康奈爾、麻省理工學院等，其中很多都是現在說的「常青藤大學」。

胡適是第二批庚款留學生中的一員，當時他考的是第五十五名。最初胡適去康奈爾大學學的是農科。胡適考取後，到上海等船出洋，二哥紹之從東北趕來送行，以家道中落，勉勵胡適出國去學鐵路、礦冶，以振興家國。可是胡適對路、礦都沒什麼興趣，但為避免兄長失望，決定出國學農，以農救國。從胡適的留學日記可以看出他當時在美國的求學狀況。順手摘了幾則，依稀可見胡適的生活狀況。

「讀仲馬小說，讀康奈爾傳結論，刪去二百字，存百字耳，打牌。見《小說時報》登上海俊人小影，知我前所識之某某皆負盛名矣。」他讀的是農科，卻仲愛文學。並且，就像初出國門的人一樣，對於國內人事的變化很留意。

「今日為勞動節，為休息之日，打牌。讀仲馬小說，吾讀《伏隱記續集》，已盡六巨冊，亦不知幾百萬言矣。」繼續讀文學書，也繼續以打牌消

### 如是我見



在日本這次大地震之前，有一個旅遊團遇到了這樣的事情：日本的當地導遊看到名單上有一個人姓衛，立即興致勃勃地談起漢代的衛青和衛皇后來。結果，看到我們這位姓衛的團員一臉的茫然，她認為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她很失望地說：「自己有這樣驕傲的祖宗，怎麼能夠輕易地忘記呢？」

國學大師辜鴻銘赴日講學的時候，看到中國文化在日本的發揚光大，十分震驚，他說：「實際上日本人都是真正的日本人，應該說，今日的日本人都是唐代的中國人，那時中國的精神今天在日本繼承着，而在中國都已經大部分失傳了。真正得到中國文化的精華，只有今天的日本。」

日本的歷史短，也談不上有什麼古代的文化，但是，現代的日本人，卻把我們的文化融會貫通到了精妙絕倫的地步，無論是《孫子兵法》，還是《論語》，還是《三國演義》，他們都駕輕就熟地應用到了所有的領域。

二戰時，日本研究《孫子兵法》成風。戰敗後，《孫子兵法》廣泛應用於日本的外交、商業和文化體育領域，有關著作達到上千種。研究者近百萬。日本的《孫子兵法》研究專家，曾經將其撰著的《新編《孫子十三篇》》全五卷呈獻毛澤東的服部春生這樣說：「今日躋身於世界先進企業之列的日本企業家的成長，主要取決於《孫子兵法》。」

大橋武夫侵華時學習到了《孫子兵法》，作為兵法經營學派的首創者，他使東洋精密工業企業死而復生不斷壯大。而日本的軟件巨頭孫正義學習了《孫子兵法》之後，用「智信仁勇」創立的「一流攻擊群」方法，把自己的企業引領到行業的最前沿。

日本現代企業之父澀澤榮一是運用中國文化經營企業的典範。他一手拿算盤，一手拿《論語》，成為日本企業爭相效法的偶像。他認為，《論語》是「工商之本」、「商業聖經」，忠、孝、仁、義的儒家學說與在商求利的算盤並不矛盾，關鍵是做到「見利思義」，他根據自己對《論語》的理解，提出了著名的「士魂商才」的觀點，打破了官尊商卑的陋習，創立了五百多家企業，並成為日本儒商旗幟。而本田公司的創始人本田宗一郎則信奉儒家的「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他處處運用儒家的觀點，知人善任，盡早隱退，親屬也不能進公司，成為世界企業界的佳話。

日本對中國文化的推崇和應用，千百年以來未曾中斷。日本的國學大師內藤湖南把中國傳統文化當作衣服，他說：「雖說是從中國借來的衣服，但當中國人脫得精光時，日本人身上總還有一件穿在身上沒有脫下。」

日本前首相竹下登訪問中國的時候，面對浩瀚的中國文明感慨萬千：「中國是日本的文化和源頭和民族的精神故鄉，今天，我們日本人所以一聽到絲綢之路、敦煌、長安這些詞就激動不已，就是因為這種文化至今仍然強有力地活在日本人的心中。」我們的文化在日本生根發芽，幫助日本事業發展壯大的事例比比皆是，不勝枚舉。面對這個對我們的文化好學不倦，從我們的文化中無窮智慧的鄰邦，我們除了對祖宗的偉大感到驕傲之外，更多的還有幾分警醒和深思。不然就真如當年徐悲鴻的預言了：「日本文化還將興起，中國如不振作，而代代之者將是吾歐國之日本人代表東方藝術，倘不幸如是，我們將有何顏面以對祖宗。」

## 中華文化成為日本的智慧

魯先聖

香江眺望

(攝影) 眞如



的支持與信任。

另一方面，我認為可能與道教擅長煉丹、採陰等「房中術」有關。所謂「煉丹」，便是製作壯陽的「土俵哥」。從金石、汞、硫磺等成分中，經爐火中煉成丹藥。這些丹藥，大多燥熱易成，毒性很大。服用以後，遍身煩燥，慾火燒身。明代的嘉靖皇帝在服用丹藥後，經常折磨後宮少女。以致激起宮闈叛變，差點被十幾個宮女勒死。

而他的兒子隆慶皇帝則更加荒唐，他在服用丹藥後，「陽物晝夜不仆，遂不能視朝」。這些熱衷於壯陽的皇帝，雖然能夠朝夕御女，但最後都不免縱慾而亡。

像元朝的成宗、武宗、仁宗、惠宗，明朝的正德、嘉靖、隆慶、萬曆、天啓等皇帝，幾乎都是迷戀後宮妃嬪，不加節制，縱慾亡身，成為風流的「短命鬼」。

### 延 靜

韓國教授金俊煒今年六月初在首爾辭世，享年九十高齡，我事後得知，不勝痛惜，往事也一幕幕湧上心頭。我認識金俊煒已近二十年，最後一次見到他是兩年前往北京大學的訪問，他與這所大學的關係非同一般。因為他的學生楊通方在東語系任教，而且他還在那裡結識了一生治學的季羨林教授。早在中韓建交前夕，他就推動北京大學成立了韓國研究中心。因此，他一年至少來北京大學一兩次，而北京大學也很重視這位不同尋常的韓國朋友，每次他來都要設晚宴招待。我是東語系的畢業生，又在韓國任職多年，與金俊煒關係較熟，就沾了光。「您這次仍然是「一個人來的？」我問他。他指指身邊的粉杖說：「只增加了它。」說罷笑起來。我真不能不佩服他，都到了望九之年，還一個人說來獨往。

### 東西走廊

金俊煒對中國一往情深。年輕時，他曾被日本抓去當勞工，他不甘心，偷渡到中國上海，參加了韓國臨時政府工作，輾轉各地，就是那時擔任中央大學朝鮮語專科的老師，楊通方就是那時他的第一批學生。日本投降後，朝鮮解放，他曾帶領楊通方去漢城留學，不想朝鮮戰爭爆發，師生離散，天各一方，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實行開放政策後，他們才有機會在美國舉行的一次研討會上邂逅。正是由於這個原因，他與中國深深結緣。他曾出版長篇回憶錄《我的長征》，回憶他在中國的曲折經歷，感慨萬千。

## 老教授的風骨

金俊煒最讓人欽佩的是他的不凡風骨。幾十年來，金俊煒一直在高麗大學任教。這所大學成立於一九〇五年，具有抗日民族傳統，民族意識濃郁，擁護「民族自大」之意義。金俊煒有「民族自大」之教育，從教授一直作到校長，矢志不移。朴正熙總統曾邀請他出任總統一部長官，他嚴詞拒絕。盧泰愚總統邀請他出任國務總理，他也沒有接受。傳聞他還幾次被邀請出任駐外使節，也被他拒絕了。

### 文化什錦

恐怖大佬拉登被擊斃後，有新聞報道說，在他的豪宅中，發現藏有偉哥。拉登年歲已高，卻擁有四個妻子。服用偉哥，想必是起壯陽的作用。

當然，即使是盛行一夫多妻制的國家，一般平民，比起古今中外的獨裁者——皇帝來說，也可說是小巫見大巫，微不足道了。自古至今，世界各國的君主們，大多都是「三宮六院，七十二妃」。而皇帝則天天都要消耗精力，以身體健康作為這筆的資本。長年累月，積勞成疾。縱然每天山珍海味，各種營養滋補，恐怕都難以應付。一旦性功能減弱，勢必要在壯陽上大做文章。

那時候，還沒有發明偉哥，只能服用起陽的春藥，或是吃一些增強血液循環的鹿茸、牛鞭、淫羊藿之類的壯陽食物。然而，頻繁的性生活，畢竟會

## 皇帝壯陽

鄧小秋

直道晚年，他每天上午堅持到辦公室上班，中午通過一條地下通道，步行到一家酒店餐廳用午餐，這是他多年的習慣。我退休後幾次去首爾，都到那家餐廳與他相會，用不著事先聯繫。但現在再也見不到這位可敬的長者，不禁清然。

金俊煒一生簡樸，專心治學，不恃聲揚。他做最大的「官」，就是社會科學院理事長，但與中國不同，它在韓國不過是一個財團資助的純民間學術機構。

並推動這些大學與高麗大學建立了友好合作關係。每次出行，他都只帶一身西裝，帶幾件替換的襯衣，沒有秘書和助手陪同，隻身一人往返，顯示了一位學界耆老從風範。在他心目中，最尊敬的是年長他十歲的季羨林教授。他兩次訪問韓國，給予盛情款待，而在北京大學相見，每次都要促膝長談很久。對教育事業的熱愛，把他們緊緊地連在一起。

後，仍專心致力於教育事業，除著書立說外，主要精力投入與中國各地的教育交流。這期間，他來中國幾十次，訪問各地大學，結識教育界人士，都只帶一身西裝，帶幾件替換的襯衣，沒有秘書和助手陪同，隻身一人往返，顯示了一位學界耆老從風範。在他心目中，最尊敬的是年長他十歲的季羨林教授。他兩次訪問韓國，給予盛情款待，而在北京大學相見，每次都要促膝長談很久。對教育事業的熱愛，把他們緊緊地連在一起。

## 李白不敢的，李俠文敢

羅孚

李白是中國唐朝的大詩人。李白不敢吟詩是有這麼一段故事的。故事發生在武漢，大江流日夜，詩人應有詩，唐朝有個名叫崔灑的人，就在長江邊上的黃鶴樓做了一首詩，「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李白後來到了黃鶴樓，知道崔灑有這樣一首詩，他本來要題詩黃鶴樓的，卻因此不敢動筆了。後來的詩人因此更加不敢動筆。

李俠文不以詩名，為什麼他卻敢呢？因為時移世易，江山隨時代而有變化，風景也大大變了，變得今勝於昔許多，寫出來就容易勝過古人了。

李俠文是一九六〇年從香港北上武漢，前往北京的。那時武漢有了前所未有的風景——長江大橋，但還沒有重建黃鶴樓。黃鶴樓事小，長江大橋事大。這些風景使李俠文的詩心也大了起來，在「李白不敢題詩處，我欲題詩在上頭」了。

他只是「欲題詩」而已，並沒有真正「題詩在上頭」。那時候黃鶴樓還沒有重修，還沒有可以題詩之處。他的詩最早刊出時是在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不是登在他工作所在的香港《大公報》，而是發表在《清華大學九級校友通訊錄》第二十一期。發出的是作者的書法照片，詩無題而有跋：「今春北遊，道出漢皋，瀏覽長江大橋。同行者指點黃鶴樓故址，謂此樓即將在附近重建。行見江山更增秀麗。歸而賦此。庚子初夜，俠文。」

這首無題詩是以「七古」為題刊出的：「樓失黃鶴鶴空樓，白雲千古空悠悠。但剩嘉名級遺址，詞人懷古發清愁。今日神州欣再造，滔滔笑指大江流。龜蛇俯伏巨橋出，楚江千里泛金流。飛車走軸無晝夜，九省通衢名實侔。無限春光來四面，風物昌明快旅眸。層層樓閣連雲起，參差稻浪迎風浮。高爐轟映漢陽樹，紅帆長飄鸚鵡洲。風移俗易成真覺，六億一心爭上游。大破大定乾坤轉，意氣曷止驅萬年。如此情景絕千古，古人夢寐安能求。古人古事今已矣，今人勝概古無俦。江山作意添佳趣，行看結構邁前修。崢嶸指顧雄三鎮，寥天仙羽來歸休。龍騰如錦江如帶，何當一放歌淹留。李白不敢題詩處，我欲題詩在上頭。」

我看到這首詩是在《韻藻精華——清華百年詩詞輯錄》上。這是清華大學為慶祝建校百年而出的。厚重的上下兩冊。詩無題而有跋：「今春北遊，道出漢皋，瀏覽長江大橋。同行者指點黃鶴樓故址，謂此樓即將在附近重建。行見江山更增秀麗，歸而賦此。庚子初夜，俠文。」因此此詩並未題上黃鶴樓。庚子是一九六〇年。距今已五十多年了。有此一跋，讀者方知何以李俠文如此「亦狂亦文」，狂到李白不敢題詩他卻敢。世界不同了，不但有了黃鶴樓，還有了長江大橋，不但有一座長江大橋，住在武漢的親戚告訴我，在武漢境內，長江大橋已有八座。在香港的孫兒告訴我：在湖北境內，有長江大橋十七座。他們都是從互聯網上查得的。李俠文已於二〇一〇年去世，得年九十六歲，是少見的百歲新聞工作者。

為什麼清華登李俠文的詩呢？因為他是清華畢業的，一九三七年畢業，一九三八年進入大公報，由英文電訊翻譯而社評委員、而編輯主任、而總編輯、而董事長，最後是名譽董事長。晚年時作雜文，署名呂章，發表在《大公報》副刊上。

李俠文精於書法，他的這首七古的原作若找得到，刊成碑石，豎立在黃鶴樓上，當可為一景色。